



庚子年,母亲八十八岁,俗称米寿。

姐姐从浙江回安徽望江过年,我从老家接母亲到县城。侄女带孩子也从深圳回到小城,说年三十陪奶奶吃年夜饭。因疫情不便久留,吃过年夜饭,侄女坐便车回乡下婆家。

年初三,姐姐说初六要赶回浙江,她放心不下俩孙子。我要留母亲在县城跟我住,母亲执意要回老家,说农村老家安全。正月初六开车送母亲回家,对门的堂哥戴着口罩过来说话,说母亲在家比在县城要好。我对堂哥说,拗不过母亲,要回来,拜托堂兄多照应。堂兄说,二妈自己能动,你放心。我点点头。其实我哪放得下心啊。

正月十六,老家隔壁村发现一例新冠肺炎感染者,是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,在武汉读大学。村子里一下炸开了锅,村民自发封村封路,所有近距离接触者,自我在家隔离十四天,严禁出入。封村坚决,封路果断,隔离迅捷。好在母亲住的老房子没被封进去,让我能三天两头回趟家,把母亲吃喝用的送过去。每次回家,母亲说,你把口罩戴着啊。其实我出门都戴着口罩的,只是一到家我就收起来了,怕母亲紧张。想不到母亲还反过来叮嘱我要注意。听说武汉疫情死了不少人,母亲说,我都这么大了,把我们这些人收走,就别收年轻人啊。在母亲的思想里,大疫就是老天在收人走。

邻村的大学生康复出院,所有亲

密接触者也过了观察期,封的围栏在一个晴朗的天气里拆除了。笼罩在村民头顶的阴霾逐渐散去。

武汉解封,村民陆续外出,广东、上海、浙江。广东是老家人的一个主要集聚地,为了谋生,他们不得不选择出行,乘坐飞机、高铁或者自驾,奔赴全国各地。这样的归来与外出,对于他们来说,像候鸟一样。混得好的,已在打工的城市买了房;差的,也在家乡建了别墅。飘得再远,混得再好,过年了,都得回来。这是故土,背不动,就只有不断地归来。

阳历五月,村庄又一次空荡荡了。回到故乡的人走了,带走了热闹和生气,他们去往异乡,一个比在故乡生活还要久的地方。故乡走不动了,留在了原地。

天逐渐变暖,母亲在老屋的屋前屋后转,捡块砖放到屋脚,拾几根枯枝丢进柴房。我叮嘱母亲万事小心,母亲说,对门的腊云妈九十五了,还在做事。我一叫母亲少操劳,母亲不是拿腊云妈比较就是拿银荣妈说事。我家左对门是腊云妈,右对门是银荣妈。银荣妈九十四,除了腿摔了不能走,其他一切都好着。母亲多病,时常埋怨自己,说没修来一个好身体。其实人老了,是和病痛共生的。银荣妈八十九岁那年摔伤了股骨,医生建议

庚子年杂记

李俊平

保守治疗。本来喜德哥(银荣姐的丈夫)是准备那年拆旧屋盖新房的,但怕老人一旦熬不住走了,就取消了建房计划。这一等,五年过去了。喜德哥对我说,明年无论如何要重建房子,不能再等了,孩子们全在外面,再等我也没力气做了。喜德哥七十二岁,五年前能担水劈柴。现实把老人逼得像年轻人,把年轻人呢,逼成了一个个老人。

夏天,长江大水。水位超历史,防汛形势严峻,留守村庄绝大部分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。但每家每户都轮流上大堤,日夜值守。外出务工的陆续召回,确保内圩安全。巩固圩搬迁,以备泄洪。四号段出现管涌,部队官兵奋战一昼夜,排除险情。和母亲商量,是否随我去县城,母亲果断否决,说那么多人都在,我一个老人怕什么。我被母亲的语气给震慑住了,一时无言。从父亲九年前去世后,母亲以老屋和孤独为伴。我呢,一心挂两头,在故乡和县城之间来回奔波。仔细一算,这一年回家的路程,我跑了近五千里。

大水开始退时,九十五岁的腊云妈静静地去世了,母亲说那是前世修来的福。一个清早,堂弟电话,说他爸去世了。父亲兄妹四人,三兄弟依次离世,在另一个世界算是团聚了。与母亲同寿的姑

姑,让表弟带到了上海,一边打工一边照顾。

转眼到了庚子年的阳历年底,这一年人过得仓惶而匆忙。世事多变,人生无常。但放眼所望,依然是忙碌的人流和奔驰的车流,像出逃一样,人们各自奔向所要到的地方。我的愿望很大也很小,愿国运昌隆,愿母亲平安度过庚子年的冬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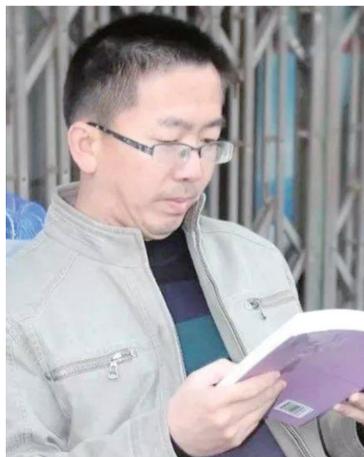


李俊平,笔名东湖,现居安徽望江。曾获安庆市“首届作协奖”,安徽省作家协会首届散文大赛金奖,安徽省作家协会第二届小说大赛“古井杯”江淮小说大奖。出版个人散文集《时光的划痕》等。



接到商会方主席电话时,我正走过二中门前的林荫道。一路黄叶踏着脚步,沙沙响,于凋落之悲外,又有寒夜故人来的微温。

这个冬天不太冷,冬至都过去几日了,中午的阳光还是干燥软乎乎的,让人不由得心生欢喜。方主席很少给我打电话,这个时候找我,不用接也知道个大概,应该是年会吧。电话还没接通,我的心就暖了——如果没有缘故,谁喜欢孤独呢?何况是一帮子有趣的同行。每次聚会结束后,大伙儿都约着下一次。



董改正,1975年生,安徽铜陵人,2013年开始文学创作,有一百多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当时明月在

董改正

我想我应该是满脸微笑着说出“有何指教”的,我将手机放在耳边时,大块的阳光照到脸上。这样铺垫下的任何故事,都应该会有酒酣情热的结局。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,是我熟悉的,就像一件穿惯了的老棉袄,虽然隔了春夏秋,一穿上来还是妥帖的。

“年会参加一个?”

“好啊!今年都有哪些人?”

“还没有完全定。”

我听见纸张哗哗的声音,我能想象出他摘下眼镜眯着眼睛看名单的样子,不由又微笑起来。这小老头真是怪人,既然看东西要摘眼镜,干嘛要戴眼镜呢?

他一个个地念出来。我算了一下,除了两个新人,其余没点到的连我一起就三人了。他念着,我掰手指复述着,隔着几公里的路,我们几乎同时沉默了。一阵突如其来的风,搜罗下所存不多的叶片,哗哗地落在我的头上。

“你来吧?你来吗?你还是来吧!”我听见了他语音结尾处的那个感叹号,心里就像一面镜湖,被叹号的那个小石子敲出了圈圈波纹。沉淀在湖底的光影,就像一只只白鸟,倏忽来去。

我初次察觉洪君的变化是在他

去年的产品发布会上。那天他忙着招呼,对我只是点点头。结束后,他又忙着应酬,直到离去,我们也没有说一句话。在返回的公交车上,我反复地劝慰自己:他是太累了,他不善于应酬。但我无法说服自己,他虽然木讷,可是却有着细腻的周全和无微不至的细致。他的冷落,要不就是不屑,要么就是不知如何处置。我们之间,一定是发生什么了。

第一次相见,是朋友带我去的。我是去拜访他的,他是业界的大佬,为人却十分低调,口碑极好。我有一个朋友初人行,连简单的线条都弄不好,却将“作品”请他指教。他连称不敢,还是弯腰收下了。一天就将作品反馈回来,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他的“窃以为”。要知道,他自己的事情每天都要做到深夜,不肯宽待自己。

那天他接到电话后,两三分钟就赶到楼下,稚拙,腼腆,低调谦逊得令我惭愧,也让我内心折服,蒙他不弃,我已将他作为一辈子的好友。此后的相处,多是他提携帮助我,毫不藏私,倾囊相授。即使是他未曾展出的作品,也愿意拿出来予我借鉴,没有一丝一毫的担忧和犹豫。我们都不善饮,酒量在伯仲之间,但他酒胆远胜于我,几乎每次相聚,他都要喝到

几乎吐出黄疸。我总劝他,他总憨笑着挠头发,说:“怎么好拒绝呢?”散席后常常明月在天,他每每与我勾肩搭背,笑谑,或正经探讨。这条路上的某个冬夜,我们也曾那样走过——叶子哗哗的响声,我依然记得他抬头望月的样子。那时,树叶已经落光了。

自产品发布会后,我与洪君席间见过几次,除了免不了的互相敬酒,再无多话。后来朋友们也看出端倪,聚会相邀时,往往都是有他无我有我无他,我们已大半年不曾遇见。现在,方主席下定决心撮合,却不知道,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洪君而言,一个做好的局,就像从药店买来的量产的膏药,并不能疗愈心里独一无二的暗疾。

许多伤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或致使,就像很多伤又在不知不觉愈合,需要时间,就像需要风吹落叶子,澄明头顶的云天。每一块伤疤又都是一片坚土,适合建造反省的伽蓝。反省是人生的大药,修正自己,不伤人,亦不受伤。

“真不好意思,明天恰好是我生日,我还是跟家人在一起吧!”

我没有说谎。我听见他一声长长的叹息:“那好吧。”

聚了,散了,就像新年,来了,走了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片旷野,美好来自于所有的莅临、陪伴或路过,就像我们之于岁月,就像岁月之于我们。或许会再见,或许再也不见,但曾经共有的明月,曾沐浴你我,你不会忘记,我也不会,这也是美好的,就像一钩弯月。